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促进高等学校图书馆各项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推动整个高校图书馆事业继续健康发展，1986年新春伊始，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图工委秘书长会议。

会议由该委员会庄守经和肖自力两同志分别主持，中顾委常委、全国高校图工委主任委员周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讲了话。周林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1981年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以来，全国和各地高校图工委的工作，赞扬了全体高校图书馆工作者克服困难、发奋进取，为教学科研服务所取得的成绩，重申了图书馆工作在高等学校

教学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肖自力在会议上总结了高校图书馆事业近5年来的进展，指出今后几年，要继续推进图书馆的改革，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抓思想观念的转变；(2) 抓管理改革；(3) 抓立法；(4) 抓规划、定奋斗目标；(5) 抓队伍建设；(6) 抓协作协调和整体建设；(7) 抓工作评估和成果评奖；(8) 抓对外交流。

会议期间，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同志两次到会，听取代表们的讨论和对搞好图书馆工作的意见、建议，并于2月27日上午作了重要讲话，使全体与会同志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朱 强)

记《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

1985年初，受中国出版者协会委托，北京图书馆开始着手筹办《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并于1985年12月12—22日参加了中国出版者协会、香港三联书店等单位在香港地区举办的《中国书展》。

在筹办中，我们本着“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及“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等原则，在确定展览内容与体例上，做到既消化吸收前人的经验，又要在思想观点、表现形式及体例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为了了解国内外对“中国书史”的研究状况，我们学习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及资料，特别研究了陈彬和、查猛济先生所著的《中国书史》，及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等著作，以及钱存

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台湾学者叶松发先生的《中国书籍史话》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展览名称的含义，定名为“中国古代书籍史”，并就展览的内容及体例作了考虑和划分：

1. 文字的产生是书籍制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文字的产生和演变内容列为第一。

2. 把书籍划分为初期书籍和正规书籍两部分分别叙述，这样条理比较清楚，且易于展览形式表现。

3. 书籍生产材料和伟大变革（纸的发明和应用）与书籍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包括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等）是本展览应重点突出的内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是和书籍有关，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

4.书籍的装帧形制和修复、保护两个问题,亦应作为展览的两个部分分别讲述;等等。

这样,我们这个展览就不再是常用的“编年体”了,而是把书籍史中的问题按类集中,形成专题,即“纪事本末”体裁,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排中国古代书籍史的内容,比较容易以展览的方式再现。为此,《中国古代书籍史》分为了八个部分,即:

- 1.前言
- 2.文字的产生与演变
- 3.初期书籍的产生
- 4.正规书籍的产生
- 5.书籍生产材料的伟大变革
- 6.书籍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
- 7.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
- 8.古书的修复与保护

在展览筹备过程中,我们突出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在“文字的产生与演变”中,除叙述语言、传说、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外,还绘出“文字演变示意表”,该表中文字以时代为划线依据顺序排列,克服了以前按文体排列文字时时代交叉现象,比较清楚地展示出我国汉字从甲骨文直至简化字这一不断发展的过程,使观众一目了然。

2.把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及早期石刻文字作为初期书籍来陈列,划定了正规书籍产生的时限,在正规书籍的发展中,强调了“书籍的创作”这一内容。我们认为,讲书籍史,首先要揭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文化风尚下,创作书籍的不同历史背景,从而使书籍史建立在可靠坚实的内容和历史的分析上,而不单纯讲述它的外部形式,这是区别于其它书史的。

3.在“书籍生产材料的伟大变革”中,重点突出了造纸术的发明、发展对书籍的影

响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造纸术的发明,直接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式和装帧形式,有了纸张,才使印刷术得以发明,因此,纸的发明不仅仅是一项科学发明,它是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分内容,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4.在“书籍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中,突出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王桢的历史功绩。他们的两项发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促进了中国书籍的生产,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5.在“书籍的装帧形制”中,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按照古文献记载的“旋风装”形式,展示了有关“旋风装”的内容。这亦是本展览特点之一。

6.“古书的修复和保护”一节内容,是以前各家书史中均未提及的,是体现《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特色的重要部分之一。

在实物展品的选择上,由于场地的限制,我们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尽量用有代表性的展品来表现展览各部分内容。在陈列的展品中,有我国云南少数民族曾使用过的结绳、刻木记事的实物标本,有举世闻名的“殷墟卜骨刻辞”,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史墙盘”、“周原甲骨刻辞”、“侯马盟书”的复制品,以及本馆珍藏的著名的“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残石和“唐人写经”、“赵城金藏”等等。在古书籍装帧形制部分,我们准备了各时代装潢精美的装帧形式样本,还准备了残破书籍及其修复后的样本,使观众通过对比,可以领略到我国特有的古书修复技术和技艺,看到这一高超技艺神奇的力量。

为表现我国手工造纸技术的发达,我们特地收集了全国一些盛产手工纸地区生产的手工纸,与在本馆搜集到的各式古旧书皮纸合并在一起,共一百余种,制成“旋风装”形式,可使观众对我国手工纸技术有一个直

观的认识。

为使展览层次清楚、语言通俗易懂，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负责人亲自撰写展览各部分的文字说明，几经修改后，聘请北京地区楷书字高手誊写，使展览在坚持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同时，平添了一层古朴、庄重、严肃的气氛。

由于《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体例新颖、重点突出、脉络分明、层次清楚，且坚持了最初确定的“三性”原则，及“雅俗共赏，高下可看”的办展目标，随《中国书展》在港展出期间，吸引了广大观众。展览共计展出十一天，参观人数达十五万余人。

展览首先吸引的是电视台、报界和一些内行观众，得到他们的赞扬。香港学者徐伯郊看过展览之后，十分佩服，连看了两遍，仔细观味。香港大学一位女士对展览兴趣颇浓，要求从头到尾给予讲解。香港上层人物陆国兴，偕夫人来看展览，表示赞许。香港电视台摄制了全套展品录像，无线电视台还在早晨最佳节目时间邀请该展览负责人到电视台为广大观众专门讲解中国古代书籍史，并向观众详细介绍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籍收藏情况。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社记者还就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专门访问了李致忠。这些报刊都以醒目的标题评论、介绍这个展览：《重温中华文化史的重要一课》、《值得仔细参观的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古代书籍史展——中国书展项目之一》、《展览中的展览，知识趣味兼具》、《中国古代书籍史专室，设计古雅观者印象深》，等等。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港《文汇报》还在题为《故迪智慧的书史展览》一文中，称北京图书馆筹办的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是“作出了一项造福人们的贡献”。

在十一天的展出中，越到后期观众越踊跃，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是三五成群自发

地来参观展览，不久就是有组织、有预约地前来观看展览。如浸信会学院和一些中学都预先约好参观日期，由主持人讲解，颇受青年欢迎。仅一个星期六的一天，前来参观的学生就有九百多人，在展览的最后两天，由于参观学生人数太多，许多人在展场外排队，等候入场。一位学生参观以后说：“这个展览思古鉴今，极富教育意义，使人清楚、扼要地了解中国古代书籍史的大概，对我们深有教益。”有的观众在留言簿上建议将书史展览印成画册，还有的观众建议将《中国古代书籍史》制成幻灯，向学校发售，说“这将是绝好的教材”。

《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在港展出期间，香港大学还曾提出邀请，希望展览结束以后，能在该校展出一两天，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该校要求没能实现。展出期间，还接到新加坡有关方面的邀请，希望《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能在1986年年底在新加坡展出，和那里的广大观众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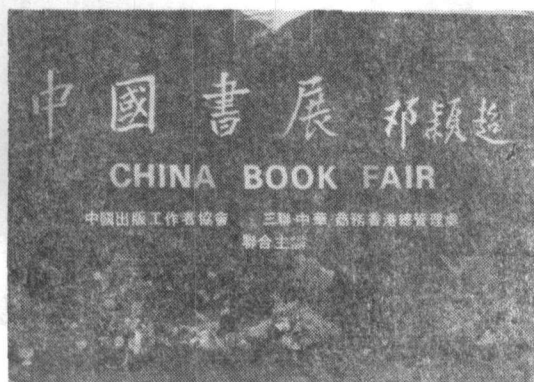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是成功的，展览效果是好的，完成了在香港地区向广大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任务，同时，也使海外人士，加深了对古老、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的认识，它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筹展组 杜伟生）



中国书展

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图片一组)



苍颉造字 薪火有传(范 曾)



文见第31—33页